

SOM

专集

〔德〕维尔弗里德·王 编著
杨昌鸣 郑利军 李湘桔 译

1

评论

维尔弗里德·王
塞西尔·巴尔蒙德
肯尼斯·弗热普顿
珍妮·霍兰德
杰西·赖泽

项目

宾夕法尼亚车站
科威特警察学院
麦迪逊大街150号办公楼
玛丽娜海湾银行总部
樟宜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
玻璃与钢的结构体系

访谈

德特勒夫·默廷斯
——对沃尔特内奇的访谈

天津大学出版社

SOM

专集

【德】维尔弗里德·王 编著

杨昌鸣 郑利军 李湘桔 译

天津大学出版社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2-2004-146号

©2001 Editor, Hatje Cantz Verlag, Ostfildern-Ruit, authors and photographer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SOM 专集. 1 / (德) 维尔弗里德·王 (Wilfried Wang) 编著;
杨昌鸣, 郑利军, 李湘桔译. —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5.8
ISBN 7-5618-2182-4

I . S... II . ①维... ②杨... ③郑... ④李...
III . 建筑设计 - 作品集 - 德国 - 现代 IV .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90212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 (邮编: 300072)
电 话 发行部: 022-27403647 邮购部: 022-27402742
印 刷 浙江港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20mm
印 张 9.75
字 数 201千
版 次 200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8月第1次
印 数 1-3000
定 价 65.00元

目 录

7	导论 客观的评论
16	评审纪要
32	宾夕法尼亚车站的更新与扩建
52	科威特警察学院训练中心
72	麦迪逊大街350号办公楼
88	玛丽娜海湾银行总部
104	樟宜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120	案例研究：玻璃和钢的结构体系
136	德特勒夫·默廷斯对沃尔特·内奇的访谈
153	工程名录
155	图片来源

导论

客观的评论

2000年底，来自SOM公司的合伙人的一份不同寻常的邀请函分别寄给了5位人士：艺术家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纽约）；建筑师杰西·赖泽（Jesse Reiser，纽约）；结构工程师塞西尔·巴尔蒙德（Cecil Balmond，伦敦）；建筑师、历史学家兼评论家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纽约），以及建筑师兼评论家维尔弗里德·王（Wilfried Wang，柏林）。

邀请函询问5位人士是否愿意对SOM公司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和伦敦的4个事务所近期正在进行的46个项目中的某些项目进行评审。之所以选择这个小组，不仅因为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可以构成一个评审委员会，而且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由于在其他的专业领域有广泛的兴趣而为人熟知。

这一事实被后来的个别方案的讨论所证实：评审是理性、简洁而具有建设意义的。不同寻常的协同作用在一天之中有助于理解和专心评审的选择过程中明显地显示出来。

评审委员会的任务是为新的SOM专集、也是第一本其内容完全由外人来编辑的刊载项目作品的专集挑选5至6个方案，这是一种被认为能够尽可能客观地评审的不同寻常的程序。

经5位受邀者一致同意，确定评审委员会于2001年3月18日在纽约事务所召开。5位受邀者均对世界上最大

项目之一的评审程序饶有兴趣；他们都非常想了解近年来已经实施的项目的工作性质。这将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抑或它们可以反映SOM公司某些新进展的轨迹？它会是一种老生常谈？他们在其评论中会有所保留？抑或它将是一件开放的和有见解的事件？

评审委员会的条件很简单。在评审过程中没有来自SOM公司的任何成员的约束、激励或干扰。评审委员会的5位成员在确定选择标准时是完全自由的，任何方案的入选或排除均由他们作主。之所以如此简明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哪个评审委员也不会参加。

包含一份解说的46个方案用4或5台小数码打印机打印出来。这些方案裱贴在两个会议室的墙上。上午耗费了一些时间来理解方案，并开始了第一轮讨论以及挑选。午餐之后，将焦点集中在一打或稍多些方案上面，并进行了最后一轮挑选和剔除，以便达到选出5至6个方案的目的。

经过编辑整理的评审委员的评语都收录在本书中，它准确地反映出各位评审委员的见解和感想。在第一轮的正式表决中得票最少者入选，在接下来的轮次中则以得票多者入选。最后的5个方案和1个研究项目事实上都是在一致的称赞中选定的。现在，在这本专集中，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也收录进来，以便感兴趣的媒体加以评论。

SOM公司为了达到评审该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事务所近期作品的目的而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的做法，自然会引发对于为何会有兴趣进行这样一种充满潜在挑战性的程序的疑问。有哪个公司曾经进行过这样一种公开化的、客观的评论？在同意将评审标准公开的过程中，这样一种程序会有何种结果？

在任何普通的竞赛中，评选的结果都会产生获胜者和落选者。因此，一个方案的排除与另一个方案的入选总是与一方的失落感和另一方的自豪感交织在一起的。毫无疑问，一旦评审结果揭晓，各个参与者，从团队成员到不同的合伙人，当然都会各有不同的感受。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先前安排这一举措的人士也会遇到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毫无疑问，对于另一组评论家的结果，尤其是公布的结果将会是种责难，这样的想法也会掠过某些参与者的脑海。

然而，作为一种持续进行的评审程序，已经付诸实施的最有创意方案的年度评论的确会被所有人——SOM公司内部和外部——视作一种前所未见的关于建筑的特性和方案的评论性演讲。5位被邀请的评论家将这一评审程序理解为在实施项目的内部和外部勾勒设计轮廓的真实意义的一部分，因而有了SOM专集。基于这一原因，经常应用阐释的长期结果，事实上可能会提出一种确实包含着真理的客观标准。呈现在这一成果以及这一杂志报道中的批评性评论，将提出进一步切实可行的中肯而真诚的建议。由于评论程序来年仍将由同一评审委员会继续进行，因此时间将会告诉人们它是否会在普遍意义上对建筑的语言以及在SOM公司的内部辩论方面产生影响。

在这一评论程序中，SOM公司超越了受雇于设计学院内部的、和风细雨的评论的做法，在设计学院中会周期性地邀请外部的评论家来进行评论，但很少进行评审

及为作品评分。在大多数建筑院校中，教员仍然像维护他们的学校和他们的学生的作品一样，维护任何或大或小的实践活动。某些院校甚至倾向于只邀请友善的评论家，亦即会看院校的眼色行事的评论家，或者——换句话说——更好地理解意识形态以及分享着与教员有影响的派系所关心的问题的评论家。

在美国，这种院校风格的壁垒已经跨越了它的领域而建立起来，这些壁垒主张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而非只说真话。就这一状况而言，新的学院派已经扎稳根基并且其延续时间毫无疑问地将与各自的系主任在位时间同样久远。与之相似，建筑的实践，无论规模大小，都受到了合伙人的巨大影响。在大的项目中，某些内部的风格可能会在元老级合伙人退休或离去的时候建立起来。然后就是转换、适应，并使实践的方法现代化，这是一个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生的过程。第二代、第三代以及接下来的若干代，掌握并重新解释以前合作实践的成员们的方法和价值。谁建构了这样一种研究？谁有时间、爱好和义务来指导在不断强调着的实践中的这样一种研究？这种转换是实际上发生的、在实干中学到的？有一个耗费时间去更有意识地反思建构这样一种重新转换的阶段吗？在SOM公司，合伙人已经主动考虑这一问题，作为广泛探索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在这本专集中所记录的正在进行中的由外人所做的评论程序。

据我们所知，尚无像这本专集一样的其他出版物存在于世。有许多空论得到了建筑公司的资助，许多还附有权威批评家的评价。在其历史上，SOM公司也曾拥有这类出版物，而近来，SOM公司允许从事评论的批评家去真实地反映作品质量的筹划再度成为空前之举。有人认为收录在经过编辑的文稿中的评审委员的评论有时十分尖锐，对于方案的作者来说甚至达到了痛苦的程度，这很可能是真实的，尽管他们在其他场合会受到赞赏。

然而，大部分评论都很到位。将来如果把来自专集的读者群的另一层次评论都包括在内，可能会很有趣味。无论如何，已经进行了这样一种程序的事实表明了近期执掌SOM公司的合伙人的透明度。这是建立在对其他公司的取向和能力的了解、对它自身的长处和弱点的自我理解、对于能够根据职业的服务以及根据赋予SOM公司以信心去继续这一程序的更加专业的建筑表述而指明方向的自信的基础之上的一种顶级水准。

当评选程序进行到尾声的时候，评审委员们感到满意了，尽管SOM公司在不同的环节有不同的反应。由于纽约的事务所提供了许多项目，毫无疑问在公司内部会有人提出疑问，而且在公司外部也必然会有人提出疑问。然而，评审委员所考虑的问题的中心，则是一座建筑对于建筑的理论所做出的贡献的理解。对于建筑转换和现代化利用的方式来说，公认的改进或改革在何处？一座建筑如何运用感知的方法去综合处理运行的要求？当结构、面层以及设备都成为任一项目的最优化组成元素的一个部分的那一时刻，建筑的自由王国又在何处？关于各种次级组成部分的和谐组合方面的复杂要求，如何借助于超越这些苛刻的专业事务的兴趣而做出最大让步？长期的项目（包括它的孕育周期以及预期的寿命周期两个方面）如何同时地在其他方面引导永恒地发展着的、快速变更着的建筑理论并且反过来也为未来的某个时段建立起基本的正确的术语？从这些观点来看，公司中的若干方案暗示出一种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传统设计的背离，以及一种带有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明显地更加严格的形式趣味差异的回归，这种差异建立在一种压倒一切的宏伟感觉之中的地域特殊性或个性内涵的基础之上。这样一种设计方法共有的理解来源之一肯定能在新造型主义艺术家的绘画和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构成以及勒·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的墙体和窗户上看到，

这种主题已经被广为借鉴和接受，而不仅仅只是被SOM公司的设计师所采纳。整体形式得以清晰地构建和理解之处，正是这种“二者/以及”的观点和追求，尽管实质上这是一种差异极大的连接形式，但在相互关系的观察方面仍然是很严谨的。受到任务的灵感启发，近期正在SOM公司中进行设计的这些方案的佼佼者都蕴含着这种跨越了整体设计的深度和广度的方法。

建筑的导向

审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设计公司之一的作品，当该公司的作品在坚持一种几乎是说教性的、建筑的一致性的时候，容易忽视业主的性质的变化。正如后来公司的内部评论者所提及的那样，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从最早的稳重而理性的公司和教育机构到历史主义构成技术和形式上的相互交融，这种导向的变化，不仅已经影响了诸如SOM这样的大公司，而且也影响了活跃在那一时期的几乎所有的公司。在纯粹构成的拼贴主义的设计作品中充斥着古典柱式的各种简化版本，这不仅在“纽约五”（New York Five）的创建者迈克尔·格雷福斯（Michael Graves）和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的作品中分别有所反映，而且在许多主流合伙人公司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这个时期的许多公司那样，SOM公司在重新探求20世纪末期城市的传统或更特殊的被称为“高技建筑（High Architecture）”的形态的传统建筑设计方法中进展顺利。与全球投资的第一次浪潮相吻合，城市设计项目成为大公司承接任务的新口味的一部分。这样的投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他们有能力注资整个城市街区的建造，建筑工业与他们的建筑工程相匹配。这些投资需要较快的资金回报和达到所承诺幅度的收益，以满足急躁的和持乐观态度的资金管理者的要求。这些城市街区的

基地已经具备很完善的基础设施,或者这些基础设施必须是不必经过繁琐的规划报批程序就能建成的。于是,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在具有历史主义意象的城市中,第一个和最显而易见地贴近城市的项目就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首相领导下建立的位于特别专用企业区的伦敦卡纳雷码头(London's Canary Wharf)所做的总体规划(在1988年以前实施),随后就是主教门(Bishopsgate)的上层建筑(1988~1992年)和金·罗斯铁路客运站(King's Cross railway stations)(1988~1997年,仅做了方案)。这些城市规划是在具有冒险性质的公司战略布局中的伦敦扩展的一部分,导致出现少见的高密度、深入的规划和快速的建设。在构成新城市区域的许多建筑中,其造型都坚持着一种传统的法则、一种如同通过对建筑在全体业主眼中重新发挥装饰作用的尊崇而对陈旧的现代主义的缺陷做出回应一样的坚持。

毫无疑问,对于建筑的导向不仅仅出现在建筑师的实践范畴之内,而且,在伦敦,来自诸如保护组织之类的团体额外的沉重压力也施加在业主身上,并因而传递到建筑师身上。然而,公平地说,在建筑史上,那时的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建筑(Anglo-Saxon architecture)作品是由普遍的兴趣所决定的。阿比·比塞尔(Abby Bussel)在其题为《SOM公司的发展》(SOM Evolutions)(巴塞爾出版社<Basel>2000年出版)的近期著作中,对这个充满疑问的时代进行评论时,运用严谨的——或者用当前的时髦说法,“酷”的——建筑的及结构的理性主义,通过在最早的作品和翻新的兴趣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而缩短了设计的历史。但是,像这样一种经过选择的设计作品的重新展现,尽管在某些不太专业的观察家眼中毫无疑问地创造出一种天衣无缝般的连续性的形象,但对于建立连续性来说,在存在着阻隔和忽视能够

引发反应的链条上每个环节的力量之处,却会误导这种桥梁的架设。

在SOM公司的设计历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在作品中对一致性的探索。在这一点上,内部的争论和团队的讨论总是很频繁的,因而会在概念上和理智上达成一致,即便是那些原先将兴趣集中在其他方向上的团队成员也是如此,这是值得注意的。在共同的实践中,团队的态度和团队的责任、重要的特质都有一种外在的表现,从外表上来看遵循着这样的格言——团结就是力量。在某些棘手的问题上,或是对于其他给人印象深刻的问题上,SOM公司要求达成一致的这个过程是复杂的。业主和承包商的联系、公司的管理、设计团队的构成、成熟的构造做法和设计说明、与外部的沟通以及其他重要的专业问题曾经不断地被提出且记录在案。隐藏在集体的设计工作后面的如此集中的知识值得分析并且会找到众多感兴趣的读者。

在一个大公司内,对于建筑的导向一方面要求有严格的规则以及个人的投入,另一方面,为了使作为文化的、政治观点的以及在艺术和设计的领域中更概括地考虑更大的问题能够被创造性地吸收进建筑设计的基础方法之中,大的公司需要为可能确实具有有一种竞争意义的激烈的内部争论保留空间。在这种关系中,例如,在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事务所中,运用过分的方式提出所有的解决方式和组成成分——在那里有大量的设计小组都在为同一个设计问题提出建议,并由主管合伙人选择其一而摒弃其余——已经显示出内部的争论和竞争对于成为建筑先驱的公司的抱负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催化剂。

精选的项目:最前沿的建筑议题

被挑选出来的5个方案和1个研究性项目包含了在其

他被提交给评审委员会的设计中的议题。这并非与推荐的过程有关，反而表明除了对较大建筑的进展的阐释之外，还有发生在公司内部所进行的思想交流。

评审委员会所设置的一个不同的奖励类别，命名为研究项目，是建立在由一系列共同展示的较小的作品所展示出来的符合要求但未完成的工作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不具备其他所提交的方案的那种客观的特性。这些小的元素是入口的组成部分，以及诸如桥梁或楼梯等基本连接设施。评审委员会认为这些元素与那些在协调一致的、设计成功的环境的限定中独立的组成部分同等重要。评审委员会尤其被为朱比莉公园亭阁（Jubilee Park Pavilion，伦敦）和旅客转运站（People Mover Station，底特律）所设计的钢和玻璃的组合所吸引。这里所有的与小建筑有关的陈述看起来都显得比在结构上和设计上更复杂的旧金山国际机场（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更加协调一致。尽管评审委员会承认机场内开放式拱桁架具有结构象征性的整合，但对于较小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特殊尺度更直接的理解以及更好的控制，则影响到垂青于这些研究性项目的决策。对于圆形的片段所共有的兴趣，能够在巨大的镶嵌着玻璃的钢结构壳体中看到，这个壳体跨过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以前的詹姆斯·A. 法利大厦〈James A. Farley Building〉，由麦金·米德和怀特〈McKim, Mead & White〉在1914年为美国邮政总局〈U.S. Postal Service〉设计）中的两座砖石建筑之间的间隙，还能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基督教光之教堂（Christ The Light Cathedral）所进行的竞赛入围名单之中看到，甚至能在英格兰的阿斯科特赛马场（Ascot Racecourse）或阿尔加韦足球场（Algarve Football Stadium）的大看台的屋顶中看到。这些占支配地位的形式的表现具有额外的作用，它不仅需要提供普通的围护，而且要将一种纪念性的

精神象征性地注入空间，令人依稀地联想到作为其原型的罗马万神殿（Pantheon）或更多的20世纪的工业建筑。运动的复杂性，弓形穹顶的特殊方位，作为旅客经由被覆盖着的富有戏剧性的检票大厅进出纽约市的一种载体的构思，来自位于底部的铁轨的运动冲击：所有这些要素所提供的就不仅仅只是为这种弓形穹顶的存在提供一种简单的逻辑性。因此，除了弓形穹顶所具有的结构上的甚或是形式上的作用之外，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 Station）方案为这样一个不同寻常元素的整体性提供了最全面的例证。评审委员会十分清楚地注意到穹顶很容易被当作一种交流的元素，使得所有其他重要的和复杂的设计问题都相形见绌，例如在楼层之间提供一种清晰的方向感，在诸如售票厅和轨道等服务性设施之间提供一种有效的联系，避免让枝节方面的问题（传送、火灾事故等）占据上风，或者确实允许照明或空调等问题来削弱空间和结构的清晰性。宾夕法尼亚车站的设计因而表现出如何构思才能集中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的形式问题上来，从而规范了其他构成部分的性质。

就表面覆层的话题来说，借助于透明/不透明的程度创建出一种几乎像马赛克那样繁杂的丰富多彩的表面，不但能够在新加坡空港枢纽站（Singapore Airport Terminal Station）的屋顶最激进的形式中看到，还能在呈现出一种更平和的形式、但并不是说采用了缺乏考虑的方式的麦迪逊大街350号（350 Madison Avenue）和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的办公塔楼的扩建部分以及哈得逊河南岸建筑群（Riverside South）（B区）高层建筑的外立面装修设计看到。在另外的几何学的简洁形式构成中所呈现出的这种表面的戏剧性外观应归功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在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朗香教堂（Ronchamp）中所看到的窗户的构图，而在勒·柯布西耶的拉·图雷特修道院

(La Tourette Monastery) 中也能够看到一种相似的、外表上不规则的结构模式。

尤其是麦迪逊 (Madison) 大街350号, 这个对建筑现有部分进行垂直扩建的工程给评审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欧洲的范例如由埃里克·贡纳·阿斯普隆德 (Erik Gunnar Asplund) 所设计的约腾堡法院 (Gothenburg law Courts) 的扩建 (1913~1937年) 相对比, 这种扩建对于美国 (考虑到早期的波士顿海关大楼 <Bostonian Customs House> 的例子) 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唯一的。这是在空间和形式类型的城市传统中进行设计的机会, 同时也强调出加建部分是有意地使它本身及其基座之间标注出区别的一个当代元素这个事实。交替的变化和覆层的外观强化了建筑的地位, 比克里斯汀·德·波茨坦姆帕克 (Christian De Portzemparc) 设计的第57大街的LVMH公司办公楼 (Fifty-seventh Street LVMH tower) 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SOM公司的这些方案的表面处理, 是当代建筑技术避免冷桥并因而限定了其他在构造上可见的框架或次框架与整个外壳之间的空隙的结果。戈登·邦沙夫特 (Gordon Bunshaft) 的研究聚焦于原有的密斯风格 (Miesian) 和预制的立面框架的延续, 玻璃或覆层面板将会插入到那些框架里面, 由此而形成的围合就不太像网格式那样的框架, 而是由节点所构成的框架, 所以圣·里吉斯博物馆大厦 (St. Regis Museum Tower) 利用计算机的优势来控制复杂的褶皱和几何形体, 将覆层的主题转移到构造和雕塑的领域 (建筑设计团队引证了罗丹 <Rodin> 所塑造的将大衣扔过其肩膀的巴尔扎克 <Balzac> 的造型)。

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 邦沙夫特对设计的引导跨越了从对古代柱和梁理念卓越的重新审视 (实例见康涅狄格州布卢姆菲尔德 <Bloomfield> 的埃姆哈特公

司 <Emhart Corporation> 总部, 1963年), 到通过将细微的柱式相互间的穿插和置于顶部的重复而形成的围合 (见耶鲁大学的贝奈克稀有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1963年, 或者布鲁塞尔的兰伯特银行 <Banque Lambert> 总部, 1965年)。在这些项目中有两种基本的连接类型, 即平面的和转角的连接。这样的处理产生了一种连贯的秩序; 与此同时, 这些基本上互相垂直的平行六面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 因而再度强调了表面元素在特定尺度和数量上的重复要比柱式直观的感觉更优越, 并且以此来替代超大形式的建立。

在垂直的表面连接中, 显现出两种基本的处理形式。首先, 借助于材料的交替创造出一种由复杂的规则构成的马赛克式的形象, 或者说, 控制着从顶部到底部透明度不断增加的亚柱式渐变——一种类似古希腊形式的收分手法的图解版本 (例如, 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哈得逊河南岸建筑群B区)。这样的表面连接趋向于支撑主要的结构; 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来排列马赛克, 就是不要让人理解为通过掩饰而使建筑的体形得以改观。在新加坡机场枢纽站 (Singapore Airport Terminal Station) 的方案中, 装有外观上不规则的顶篷的天窗屋顶具有茂盛的树林的氛围。它那压倒一切的尺寸、漫射的光线以及几乎无限的延展性, 具有雄伟的功能特性。由于具有这些特性, 评审委员会认为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Terminal 3 at Changi Airport in Singapore) 在将这种形式的处理应用到表面的连接、建筑的雄浑以及空间表达的恰当等方面有着最全面的联系。

处理表面连接的第二种类型是通过几何形体的变化来获得的 (圣·里吉斯博物馆大厦), 在这种类型当中, 每一种连接的规则都存在于对覆层所构成的“垂帘”、织物的“瀑布”, 或者是建筑外形的象征性尺度的支撑

之中。当将其应用于高层建筑时,这样的处理就显现出为之曾付出了相当大努力的概念性基础的狭窄。在外表或真实的覆层类型与其内部空间之间通常都没有关联。因而使额外的空间和组织的操作在建筑的程序中成为可能,尽管它与在整个具有可认知性的几何结构内基于可识别性的外观的考虑相类似,这种类型的最佳实例不仅能在新加坡的因福莫尔办公楼(Informal Office)的设计中看到,而且还能在格林威治学院(Greenwich Academy)的带有顶部照明的庭院与其占支配地位的水平面相对比的抽象结构的概念中看到。无论是组织的变化还是表面的连接,二者都使人联想到由约翰·威克斯(John Weeks)(卢埃林·戴维斯<Llewellyn-Davies>,威克斯,福雷斯蒂尔<Forester>和博尔<Bor>;参见在伦敦的诺思威治公园医院<Northwich Park Hospital>的流线系统的组织和外立面设计,1962~1964年)以及由康迪利斯(Candilis)、若西克(Josic)、伍兹(Woods)特意为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设计的、被称为“垫子建筑”(Mat Building)(1963~1979年)所引发的模糊理论的争论。而这些设计本身,又受到勒·柯布西耶在拉·图雷特所设计的修道院(1957年)的启迪,只不过前者的处理范围更大一些,它们的空间的和组织的划分更详尽一些而已。在新加坡的因福莫尔办公楼中,在低层和高层的体型之间有意计划的相互呼应使人联想到蓬皮杜中心(Centre Pompidou)(伦佐·皮埃诺<Renzo Piano>和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尤其是其1970年的竞赛方案)的灵活性。三层为一组的对角线的栅格结构体系也使人回想起路易斯·康(Louis Kahn)在费城设计的明日城市大厦(Tomorrow's City Hall)工程(1952~1958年)。借助于计算机,所有的具有逻辑性的梦幻都已经变成不同寻常的可实现的工程。因福莫尔办公楼(The Informal Office),利用多功能的庞

大建筑,能够演化为在单调的城市内部场地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争的综合体,尽管它与早些时候的阿基格拉姆(Archigram)幻想的游戏般的实证主义有些接近。如果说清志麻和代(Kazuyo Sejima)在日本的本须(Motosu)设计的岐阜县北方町(Gifu Kitagata)的住宅体型(1994~1998年)是在紧凑的空间范围中一种空间和类型学的相互影响,或是勒·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1946年)的发展,那么因福莫尔办公楼就是在这个体系中从新精神大厦(Pavillon De L'Esprit Nouveau)(1925年)再度开始的另一个台阶。

在奥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的阿姆斯特丹孤儿院(Amsterdam Orphanage, 1957~1960年)中,有一种连接成串形式的单元,每一个单元都有不同的尺度,但各自在形式上都能依次彼此相关联,可以被看作是科威特警察学院(Kuwait Police Academy)的许多设计概念的先兆。以几何单元作为模块的概念,在运行枢纽和空间的构造合成之间关系的概念上,以及各种房间的等级(从尊贵的到普通的)的概念上,都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的10人小组(Team Ten)的成员(史密斯森夫妇<Smithsons>,贾恩·卡洛·德·卡洛<Giancarlo de Carlo>,巴克马<Bakema>,康迪利斯<Candilis>,伍兹<Woods>)所设计的探索性方案中找到相应的踪迹。

科威特警察学院的基本构成要素,也就是使人联想到古阿拉伯库法字体的几何学形状的所谓的“点状建筑”的组合,构成了庭院。它们高三层,为日常工作限定了中性的围合。布置在这些具有不同的铺地和线形的庭院之间的是尊贵的建筑,其形状像菱形,在夜间有引人注目的照明。在整个体型和构造的细部设计中,从对布局的几何形体的控制到预制混凝土面板形状的构成法则,二者都具有重复性以及由每个单元表现出来的同一性。作为反射空间的采光间,由詹姆士·特里尔(James

Turrell) 设计, 将会为走廊提供休息的场所。整个建筑群的立面具有一种材料的连续性, 以至于会用一个院落的材料去覆盖毗邻的建筑。因此科威特警察学院的设计被认为一方面反映了公司综合的设计和专业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为业主将不同寻常的概念性构想转化成建筑方案的能力, 而这样的一座建筑业主原先可能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项目的规模、建筑师为设计中的知识下定义的权威以及业主对设计团队的信任都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

大公司的职责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可以看到, 在业主的性质方面, 在一般的地产市场运作的规模方面, 在像毕尔巴鄂(Bilbao)一样偏远的社会对文化的渴望方面, 在建筑技术的复杂性方面, 在对职业责任的影响方面, 在建筑文件的性质方面, 在建造的牵强附会和书面的建筑争论方面, 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大公司中有责任的和有影

响的团队成员中变化的一代无疑会具有更多的特性来适应这种情况。毫无疑问, 作为这种类型的最主要的公司之一的SOM公司已经经受了持续不断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摆脱了固有的空间规划的专业服务, 而且是在建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方面再度投下赌注, 那就是, 将一份明显缺乏感情的任务书转变成空间、光线材料所构成的令人振奋的汇集。为了应付这些情况——而这些情况又决非在每一项委托中都是有效的或会发生的——在公司的权威和规模方面摆脱的比它应有的还要多。5个入选方案和1个研究性项目, 以及在这里所提到的其他工程中显现出来的令人感兴趣的相关问题, 证明深信不疑的业主们能够获益于这样一个大公司所蕴含的雄心和技巧。业主是如何信服, 以及像SOM这样的公司是如何为了创作出杰出的方案而在恰当的时间建立了恰当的团队, 这个秘密理所当然地会继续保持下去。但我们确信, SOM公司的建筑师, 将会续写公司历史的新篇章。

维尔弗里德·王, 2001年6月于柏林

